

世界經濟中的亞洲

羅斯陶

——(Walt W. Rostow 曾任美國詹森總統之國家安全顧問，現任奧斯汀德州大學經濟學暨歷史學教授。本文為其在第九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幕典禮中之專題講演——編者)

本人以真誠的謙虛心情，向大會提出簡單的講演。嚴格說來，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原因之一是我不懂中文。今天我所要講的，將以個人在專業上比較熟悉的為基礎——諸如經濟史，經濟理論，以及經濟成長的過程等。

可是，我過去曾在頗為特殊的環境下，於一九五四年出版過一本書，書名叫做「中共的展望」。那一次的經驗，使我對中國研究發生了長遠的興趣。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無論是擔任政府公職或任教，我一直都關注這個問題。同時，我認為我在撰寫那本書的時候學到了一些東西，其中包括兩點觀念，也許對這次的會議不無關係。

但在談到實際內容之前，我或者應該說明一下自己是怎樣地涉入了中國研究。當麥克斯·米利甘(Max Millikan)和我於一九五一年在麻省理工學院設立國際研究中心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計劃——它是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就是分析蘇聯。這個計劃的部分重點是，當斯大林下臺之後將會發生些什麼變化。我以一个對這方面不會有過知識接觸的社會科學人員的身份，被挑選主持這項研究。一九五二年秋天，我們完成了研究報告，把它交給美國政府，然後在一九五三年把研究所得的主要心得出版了一本書，名叫「蘇聯社會的動力」。在斯大林去世時，我應邀到華盛頓，對於當時尚乏經驗的艾森豪政府釐定斯大林死後的初步因應立場，貢獻了一些微末的意見。不久之後，艾森豪政府又要我們對中共作一個同樣的研究。起初我不肯接受這個工作，因為我想就本身的專業寫點東西。於是米利甘接觸了幾位中國問題專家和社會科學家。但沒有一位準備接受這份研判中國大陸上種種活動因素的工作。結果他再來找我。我終於同意了，因為我認為中國將是影響美國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那時我對中國的知識只限於它的經濟史的某些方面，也許藉此機會稍稍教育自己一下，是個聰明的主意。

因此之故，我在一九五三年夏天，帶了全家去到新漢普歇州彼得博羅夫的一座舊農舍，然後幾乎看遍了一切有關中國的書籍——歷史、宗教、哲學、藝術、經濟、故事、小說、詩。老實說，當時有關中國的英文書並不那麼多。就在這一番令人愉快的涉獵之後，我才開始去注意中共是如何產生的，以及他們想做些什麼。

很偶然而且令我驚奇，我得到的總結論是：雖然中國的歷史經濟與文化也和其他國家一樣的自具特獨性質，但它所包含的最

後價值判斷，它對人的處境的看法，它對個人行為和公眾行為的道德標準，以及男男女女在生活中的活動方式，都能為西方人士所認知。我們如果不從公理的推演而從正反因素的實際衡量，去求得一個正確的結論，似乎也是一個特別而不失明智的研究方式。

現在我談談自己的兩個可能有關的結論。

第一，我對於法家朝代的生命短促，具有深刻的印象。我記得——如果錯了，請不吝指教——想把中央權力密切地深入到縣以下的中國農村生活的努力，只作了大約三十年的時間，便告失敗。這種情形頗具代表性。不管怎樣，我當時曾以自認為合乎中國習慣的方式，引用了三段中國古人的話，作為自己的最重要結論，並把它們放在「中共的展望」一書的首頁上面。它們是：

「故明主之政以力不以德」（商鞅）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孟子」公孫丑上）

「田蕞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謂之人祲。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謂之人祲。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謂之人祲。祲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荀子」天論）

荀子所描述的新朝代出現前的動亂，雖然不盡與「文革」相同，但却發人深省。如果把今日的中共領導看作三十年法家之治以後出現的另一儒家朝代，那確乎是言之過早；可是，它的種種改變相當可觀，而且也在許多方面能令所有的中國人，乃至人類，萌生希望。同時歷史可以判斷，毛記王朝僅只延續了史有前例的三十年。

另一個我要舊事重提的結論，就是關於亞洲其他部分的經濟和社會進步，可能對中國大陸的未來所造成的影響。在前述拙作的結束部分中，我曾經說過：「中共希望……自任為亞洲的主導強權，並對亞洲的最嚴重難題——人口過多與農業社會的貧窮，提供正確的解決路線。」

「這個計劃的效用如何，……顯然決定於自由亞洲在軍事及政治上的表現。假若日本仍然年年都在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危機中打滾；假如菲律賓不能在麥格塞塞的政治成功之後，以實際成果來兌現它的社會和經濟承諾；假如印尼仍然怠惰，並且因為人口激增問題而不能集中精神；假如印度不能在它以民主精神而設計的農村革命上獲致重要成就；假如臺灣不能發展成為自由亞洲中的一個創造力量，並成為新中國的一個政治結合點；總而言之，假如自由亞洲不能在改進上有其實際表現，縱令中國大陸的表現平凡，仍將在中國人和一般亞洲人心中成為相對性的重要成就。」

「就另一方來說，自由亞洲在軍事、政治，以及經濟政策上的堅實進步，可以使中共無法在亞洲自稱具有軍事和思想上的首要地位，同時更可在一段時間之後，促使各方對中共政權的內部與外交政策，重作基本性的評估。……未來亞洲情勢對於中共之影響，應該大於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五年間外界對蘇聯的影響。……中共的命運，勢必強有力地為自由亞洲的成就和缺點所左右，

同時也將由它本身在應付亞洲種種重大難題時的成敗所決定。」

並且在拙作「美國對於亞洲的政策」(一九五五年出版)中，我曾如此結論：「如果中共的擴張主義夢想被打破了，如果自由亞洲能够成功地滿足此一地區的各種願望，我們將能看到中共革命中的一個新階段。亞洲的歷史顯示，目前形式的中(共)蘇聯盟，不是能够滿足中國在世界上獲得獨立、尊嚴等願望的正確方法；同時中共的新的總路線，也不是能够滿足它企求發展經濟並使之現代化的正確方法。一個堅強而有創造力的自由亞洲，既能挫敗中共，也能向中國人顯示此外還有更吸引人的選擇存在。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向來具有深切實際精神的中國人，必然會選擇他們自己認為合適的另外方式。」

對這一點，我是毫不懷疑的。我深信自由亞洲在一九五〇及一九六〇年代所表現的非凡活力，特別是臺灣的傑出表現，已經對中國大陸目前所採的決定，以及新近推行的各項政策，發揮了強大的影響。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美國「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則來自北京的電訊，據說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曾在一個重要的政策演講中承認：「臺灣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在共產主義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之前，那裏的一千七百萬人民可能會反對和大陸統一。」

「我們一定要在經濟發展上，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超過臺灣」，鄧小平說：「沒有這個，我們不會成功。」同時他還說：「現在有些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懷疑社會主義制度，並且說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我們一定要大力糾正這個觀念。」

我從老書當中引用了一些話，並非爲了證明我的先見之明，而因爲我今天的中心論點仍然是基於中國大陸與亞洲其他部分的交互影響作用——這一點，我認爲它勢必繼續如此。在事實上，我的基本結論是：中國大陸社會的進一步演化，將實際決定於亞太國家如何處理歷史所帶來的一個問題——亦即怎樣應付下一代所面臨的經濟局勢。在最後，我準備談到若干非經濟性的可變因素，它們也與局勢的結果有關。可是現在讓我先談談我們所面臨的重大全球性挑戰，以及它對亞洲的意義。

二

五月二十一日，我在東京的一次講話中，概括地分析了目前世界經濟在歷史潮流中所處的地位，我們所面臨的共同工作，以及如何處理這些工作的計劃。那次講話的複印本，可以提供諸位作爲參考。現在我只準備摘要簡述那次講演中的五個要點，以作此次討論亞洲和中國大陸問題的參考背景。

第一，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之間，世界經濟發生了一個轉捩點；與此類似的轉變，以往曾在世界經濟中出現過四次——亦即在一七九〇年代，一八五〇年代，一八九〇年代，以及一九三〇年代。在那些時候，世界經濟的平衡曾經由價格相對低廉的基本商品轉變爲價格相對昂貴的基本商品，在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中，價格相對低廉的基本商品，正是當時空前的全球性繁

榮的基礎；而在一九七〇年代相對昂貴的基本商品，尤其是能源，正是最近六年來經濟萎縮和不景氣的主因。

第二，在歷史上和在目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快速成長的恢復，其關鍵在於投資方向的改變——這一改變將會對那些價格上漲就表示供應不足的商品，擴大其來源並抑制其需求量。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以供應為主，而非以需求為主的時代。

第三，以供應為主的世界經濟，對於下一代的特定任務，約有以下幾項：能源——包括保護，增加傳統能源的供應，和發展石油代替品；開發中地區在二〇〇〇年前，將生育率減低到百分之二十以下；開發中地區將糧食生產率增加到每年百分之四左右；保持環境，以免嚴重惡化；向先進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提供適量的原料供應。所有這些，都需要調動大量的額外投資來源，並且把它們分配到適當的部門去。

第四，這些工作，就世界經濟而言，具有程度不同的普遍性，甚至在能源方面，許多目前出口石油但地下儲量已經走向衰竭或將在一九八〇年代趨於衰竭的國家，如委內瑞拉、奈及利亞、印尼、和蘇聯等都包括在內。因此，如何完成我所列舉的全球性目標，實在是一個共同利益上的問題。

第五，假定上述某些工作獲得了全球性的一致同意，但在實施的時候主要仍須透過互相聯繫的區域合作：例如太平洋區、西半球、非洲。日內瓦的歐洲經濟組織（EEC）現在已經把能源、原料、環境保持列入工作日程，以便在該區域以東西雙方關係為基礎來處理這些問題。但在目前，中東和南亞的國家，或許還只能以國家或雙邊關係為基礎來處理本身的問題，必要時再由國際性機構予以協助。

我之所以提議要就地區而分組工作，乃由於全球性的密切配合作業可能牽涉到太多的國家反致效率不佳，也由於各地區的國家要比全球性的組合更熟悉自己的資源和可能性，更由於各個地區都自有其特殊性的問題。可是，世界銀行以及若干主要工業先進國家，可以和各個地區的組織一同工作，就連「糧食與農業組織」（FAO）與其他有關的全球性機構也是一樣。

關於全球性的概論和結構，我只談到這裏為止。就我們的目的來說，我的論點是如此的：如果亞洲的非共產國家要想保持它們在過去二十年來所發揮過的活力，並且能夠維持它們曾對中國大陸造成建設性的和有用的影響力的非凡表現，它們不僅要極力轉向以供應為主的工作——因為這些都是經濟工作的重心，並且還要以「太平洋盆地」作為中心構想而組織起來。

三

那麼，「太平洋盆地」中的這個經濟合作組織應該做些什麼？

在由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B. Krause）和關口末男（Sueo Sekiguchi）合編，並且剛由布魯金斯研究所出版的一本

研究資料中，正好就包括了一個這樣的工作項目表。這本文集叫做「太平洋盆地的經濟交互作用」。它以地區合作為結論，並且也提議形成一個我所討論過的那種組織。

就業務工作而言，克勞斯和關口合併了別人和他們自己的看法而提出如下建議：

——年度國家檢討，就像巴黎的「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所舉行過的一樣，用來討論各國的計劃與目標，並且事先找出「總體經濟」(Macroeconomic)政策上的各種不平衡，使它們不致妨害國際經濟和創立該項政策的國家。

——貿易問題，發生於未與貿易伙伴事先磋商而採取的單邊行動，以致形成相當重大的象徵性和實際上之分裂影響的時候，例如美國的禁止黃豆出口，日本的禁止肉類和石油精(naphtha)入口，以及澳洲對於勞力密集製成品的加強進口限制等。除了上述這些特殊事故之外，還有一個普通的問題，即是如何以更自由而非更有限制性的貿易辦法，來降低美國在與某些「太平洋盆地」國家貿易時所遭遇的龐大逆差。

在我看來，這些都是非常健全的提議；但是，它們還沒有把我認為是一九七〇年代最重大的挑戰性工作放在核心地位，這個工作是：透過擴大的國內與國際投資計劃和擴大的貿易，提供「太平洋盆地」為繼續實現高度經濟和社會進展所需要的能源。簡潔地說，我相信一九八〇年代能源問題將在「太平洋盆地」扮演一種催化作用，如同一九五〇年代煤與鋼鐵在歐洲整合過程中的作用一樣。此外，如前所言，還有糧食供應，原料供應，以及環境管制等等問題。

因此，我的構想是：在這個組織裏應該設有針對上述四個方面——能源、農業、原料及環境——的第一流的技術委員會。這些委員會不僅只是提供分析和預測，不僅只是交換資料和實驗新的或剛出現的技術，並且還要創訂由官辦，或私營，乃至兼含二者的投資計劃。這些技術委員會的會議，應該有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代表，以及各國政府中最負有責任的官員來參加。

透過這項建議的細節事項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兩項重大的事實。

第一，正如克勞斯和關口末男所說的(前引書第二四三頁)：「太平洋盆地是全世界中最具動力的區域。」更是美國和日本，就佔了全世界國民生產毛額(GNP)的三分之一，和世界貿易額的五分之一。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其他「太平洋盆地」國家，已經形成了一種密切的交互影響。當然，在這個區域裏面，各國的個人收入的差距很大；可是各國經濟間的相互關聯的複雜與微妙，却和「經濟合作開發組織」一樣。同時，這區域的較高平均成長率也意味着有待解決的新問題勢將出現得更為快速。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性的雙邊關係是不夠的。現在正是這個區域應該認識自己的重要性、成熟性、以及需要一種持續性的伙伴關係的時候。

第二，這個區域掌握有異常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技術能量。我們儘有一切理由相信：只要能夠把它納入一種真正的合作努力中，應該能夠應付下一代時期中的各種挑戰。

那麼，這麼一種事業應該怎樣去把它組織起來？而且誰來做它的參加者呢？

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出種種的組織，但是我比較傾向於擴大亞洲開發銀行職責的構想。對於這一類事情，我沒有教條武斷的心理；可是我認為應該充分運用具有成效的機構，同時也應該避免機構或職業性人員的添增。亞洲開發銀行已經擁有適當的會員，必要時還可以擴大；並且它的工作人員已經在蒐集並分析大部分的所需背景資料。臺灣是亞洲開發銀行的會員之一；如果這個屬於「太平洋盆地」的重要地區不被充分地納入這項事業，那簡直是明顯的毫無理性。

就會員資格的大體而言，對於真正具有嚴肅的興趣，並且願意參加持久合作的國家，都應採取開放態度，舉例來說，可以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甚至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

四

現在讓我們暫時如此假定——太平洋各國同意組織起來，共同去面對下一代時期的經濟挑戰。那麼，它們和中國大陸，以及中共政權的經濟關係又將如何呢？

我個人認為：中共政權將主要選擇雙邊往來的方式來和亞洲的其他部分打交道；這很可能也是一種開展經濟關係的合宜方式。

原因是：中國大陸的重大困難在於內部問題。它顯然擁有人力和天然資源，能在現代化方面快速前進——假如它能够改組它的政治生活和機構，以便發揮它的全部潛力。毫無疑問，中國大陸將要和外在世界擴大貿易與其他的交流、接觸。但是，這對於為整個「太平洋盆地」而提議的那種多邊性努力，恐難立刻生產強烈而廣泛的交互作用。

對於中國大陸的內部難題，這次會議日程上所列的前四場討論，將會有精密的商討。在這裏，我不準備冒昧地對於諸位不久即將開始的熱烈而深入的討論，爭先發言。可是我姑且如此猜測：中共領導的最迫切難題將是如何重組基層的黨組織，再引用鄧小平的話來說，那些幹部「已經老了，或者缺少技術或管理上的訓練，有些又大攬特權。」他們入黨是爲了最先享受，最後吃苦。」——但是中國大陸最終的兩難困境，可能仍是束縛着蘇聯的那一種：亦即在技術和黨並存的雙重指揮系統下，它所希望的效率以及人的動機、才能與精力的充分動員，總與一個甚至經過「整頓」的幹部體系格格不入。這一點，連帶又引起另一個問題：像目前構想的這種共產主義，是不是一種能使中國大陸充分現代化的可行體制。這個和更多的其他有關問題，都要留待諸位去研討。

我僅只強調一點，就像我在二十五年前所做的一樣，將來的中國大陸社會，比如說在二〇〇〇年的時候，將是什麼樣子——

它對人民能提供多少自由，生活水準如何，與亞洲其他部分是和諧相處或發生衝突，實際上都將決定於「太平洋盆地」的人民在下一代的時期中如何表現。

五

上面我所用的「表現」一詞，它的意義是超過了經濟學性質的。就事實而言，我在「中共的展望」和「美國對於亞洲的政策」中所提出的論點，就是針對當時我們所面臨的安全挑戰，中俄兩共關係上的各種困難，以及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挑戰問題。我發現這次討論會日程上的最後五個節目，業已透澈地包括了這些事項。在「太平洋盆地」中必須要有一個堅實而穩定的安全結構。它顯然是不能被任何東西所取代的。這個地區的重大經濟和社會表現，可以成爲本區安全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單有這些還是不夠的。

在目前，雖然南韓人民爲爭取較高程度的民主而造成一些困難的過渡問題，但日本和南韓的情勢看來都很安穩，臺灣也是一樣。

我們都知道，三十五年以來的東南亞局勢一向是不穩而危險的。由莫斯科所補給、支持的越共軍隊，現在已經配置在漫長而脆弱的湄公河線上——這情勢是美國政策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七五年間曾欲試圖防止但却沒有成功的。泰國一直是東南亞的一個主要戰略地區，而它之不爲中南半島共產軍隊席捲鯨吞，並不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泰國本身既然比較堅強，並且正如我們在一九六〇年代熱切希望的一樣，這個區域的國家也已組成了「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這個組織值得任何一個想在亞洲尋求和平的國家的充分支援。

但是，歸根結底的說，正如在二十五年前一樣，美國的政策仍然對於亞洲的未來具有基本性的影響。惟有美國纔握有核子的和其他的武力，能够可靠地嚇阻敵軍在目前亞洲的國際邊境和停火線上的大量移動。關於美國在亞洲的安全任務，我準備提起三個要點：

第一、雖然美國仍然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外界力量，但在基本上，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既已遠較二十五年以前更爲強盛，自須對該區的防衛負起較大的責任。目前的經濟實力已經變得愈來愈爲分散，這是一個具有動力的世界經濟所應有的現象，在這時候新興者通常能够後來居上，因此對於防衛方面的責任也該一樣。

第二、美國過去在亞洲的長期軍事介入，和它在一九七五年所遭到的悲劇結束，所給予美國社會的創傷巨痛，任何人都不可予以低估。發生在同一時間的水門事件，也影響了這個結局，因而美國顯然經過了一段惡劣的日子，其後果更牽連到所有那些會

經多少依賴美國的實力與堅定的人民及政府。無論從民意調查和公開政策來看，許多跡象顯示美國可能正在恢復它的神智和方向感。民意調查反映，目前情況已經與一年之前不同，大多數人都願意支持軍事預算的增加，也較不久之前更樂於支持美國爲了實現軍事承諾而動用軍隊。在政策方面，卡特政府不但決定讓美軍繼續留駐南韓，並且還向泰國重申了東南亞公約的意義，以及支持「東南亞國家協會」。

這些都是令人安心的跡象，可是這裏也出現了第三個問題。這問題只有我們美國人能够回答，並且不能用美麗言辭，而要用我們國家的未來表現作答。這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在內政和外交的廣泛陣線上發動具有新生壯氣的努力。顯然，我們還沒有一個適當的能源政策；通貨膨脹也不會抑止；生產力的成長根本不能令人滿意；並且我們因爲受到不適當的能源政策和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壓力，反而導致了衰退。在我們的軍隊方面，也有若干重大的缺點。在另一方面，確也有能够令人懷抱希望的跡象。

例如在能源方面，我們已經走向取消天然瓦斯和汽油價格的管制；法案已經提交國會，也許能够迅速解決能源開發與環境保持間的爭端；關於核能使用的糾纏，看來將逐漸消除；並且在經過長久時日之後，將要具體地發動各種合成物的生產。

站在一個較爲廣大的立場上，我希望諸位留心一下「聯合經濟委員會」的一九八〇年敬告。這是一個很少見的政治文件，因爲它是在選舉年中由兩黨合作提出的。它的題目叫做「走向供應爲主的路線」(Plugging in the Supply Side)。正和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以需求爲主的政策相反，它反映出一個各方集中的共同認識，認爲未來的十年需要有政策改變。無論男女，對於美國在我們今日這種「後於凱因斯」時代裏需要擬訂的工作項目，都已殊途同歸地得到了一個共同的想法。

站在一個更爲廣大的立場上，我希望告訴諸位：作爲一個去年曾在美國許多地方與學生交談討論的教師，我認爲美國現在出現了一代關心事務、工作努力、而且態度嚴肅的青年人。對於他們，一九六〇年代和那個時代的激昂爭論，都已早成陳跡。他們知道自己將要面臨許多難題。他們知道世界上沒有方便而簡單的答案。可是他們並不因此沮喪。

我的猜想是：不管一九八〇年的大選後果如何，我們將在世界局勢中看到一個更有目的，更有精神的美國。可是我們的亞洲朋友，在我們以事實證明它之前，儘有一切理由對這一點表示疑慮。

最後回到我的中心論點上來，我只準備補充一點：我曾經提議在美國和「太平洋盆地」的主要國家之間，建立起密切而又經常的合作，以決心去解決自己的難題，塑造自己的命運，並且不斷前進。這種合作既可以使美國恢復活力，也可以提醒我們：在我們的面前還有許多偉大的、有益的、建設性的前程與美景。

現在，請各位允許我對中國朋友們說幾句有關臺灣的話。

這次會議使我太太和我本人有機會在此地逗留一些時候。本人對於經濟與社會進步的統計數字，曾作長期研究；而有關這一方面的人事和制度上的活力朝氣，在我們所到之地，處處可見。這個島嶼的表現——只有大陸人口大約百分之二——以和平範例

對中共內部政策演變成重大的影響，這在歷史上並不是一件小事。

同樣顯然的是，中華民國在未來十年和未來一代中也會遭遇到一些困難的問題。臺灣正如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也面臨着能源問題及石油代用品問題；臺灣還需要儘速吸收高級電子工業、發展學（Genetics）、通訊，及其他部門所出現的技術，一如它在過去一代從消費品生產邁向鋼鐵、重工程、石化工業和輕電子工業的過程中所作的一樣。尤其重要的是，臺灣必須在歷史所帶來的偏促外交環境中從事世界性的活動。

儘管有着這些以及其他挑戰，本人願與諸位分享本人所得的結論。那就是：在過去三十年中，這個島嶼上的人民既經達到目前的境界，他們必能目睹臺灣成功的渡過未來的一代。事實是在現代的世界，沒有任何國家——不論這個國家幅員多大，國力多強——能夠完全掌握它自己的命運；但本人深信作為這個島嶼最豐富資源的男女們應該對未來滿懷信心——是即他們的命運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並且也將由他們自己來決定。

新書預告：

「抗戰與中共」

本中心為研究中日戰爭史實，邀請十餘位學者，撰寫「抗戰與中共」一書，分中日戰爭前之情勢，七七事變至全面抗戰，戰爭全期的主要會戰，淪陷區的游擊戰，中日參與的戰役，中共之坐大及其破壞活動等各章。參考文獻包括中外已公開或未公開的戰爭資料，極具價值。全書約三十餘萬字，預計本（六九）年內出版。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啓